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 元代宫廷酒器

——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

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以河北保定窖藏最为精美,其中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彩、釉里红、青花瓷凡四种^[1]。2009年,我们撰文指出这批元代高档瓷器当为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年)和延祐六年(1319年)^[2]。由此可见,元青花源于皇家艺术,元朝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地制瓷技术相结合,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浮梁磁局停烧后,汉地工匠才开始创作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青花瓷。由于文献语焉不详,加之景德镇元代窑址考古不够充分,我们把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14世纪初颇受质疑。近年景德镇考古新发现,尤其是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的刊布,可将元青花创烧年代提前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县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竹节高足杯亦属于早期元青花^[3]。今缀集所见,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瓷精美绝伦,而韩国新安至治三年(1323年)沉船未见元青花。故

有研究者试图证明保定窖藏瓷器系元代晚期之物^[4]。殊不知,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年代更早。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盘实乃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那么早在1292年浮梁磁局就开始烧造元青花了。由此推算,皇庆元年元仁宗第一次赏赐张珪上尊酒时,景德镇元青花业已烧造了20年之久,完全可能生产出保定窖藏所见精美的元青花。

张弘略是金朝降将张柔第八子,父子二人与太保刘秉忠、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一道,参与过元大都的设计建造^[5]。张柔第九子张弘范(张弘略之弟)指挥崖山海战,为元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6]。张弘略和张弘规兄弟二人随其父葬于保定市满城区岗头村张柔家族墓地,而张弘范则葬于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祖茔^[7]。

1998年,张柔家族墓地遭不法分子盗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即对两座被盗元墓进行清理发掘,可惜未做测绘记录。从墓志可知,这两座元墓分别为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墓(编号M2)及其夫人花氏墓(编号M3)。2012年6月,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重新勘测了这两



图一 张弘略墓地无头石翁仲

座元墓，对随葬器物等做了绘图和文字记录，随即刊布了考古简报。据报道，张弘略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瓷器，包括磁州窑、钧窑、景德镇窑、吉州窑及龙泉窑等凡 71 件高档瓷器，而张弘略夫人花氏墓只发现 5 件残破的北方窑口瓷器^⑧。

2016 年，首都博物馆举办“大元三都”文物展，首次向公众展出了这批元代高档瓷器。令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一件元青花托盘^⑨。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七提到元代出现的新兴酒具。他说：“古人……饮酒用盞，未尝把盞，故无劝盘。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盃、茶鍾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窑，俱无此器。”^⑩张弘略墓随葬瓷器中有许多宫廷酒器，为我们探讨 13 世纪末中国陶瓷手工业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018 年 5 月，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任亚珊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张柔家族墓地，观摩了保定市文管所库房保存的张弘略墓出土瓷器，并对部分瓷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检测。任亚珊是张弘略墓发掘简报的编写者，他确认此墓附近未见其他古墓和晚期文物。这批元代瓷器经科学整理和编号，皆为张弘略墓随葬器物。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 年），元朝降将田丰率红巾军占领保定^⑪。张弘略墓大概在这时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破坏，神道石象生全被推倒，石翁仲头部被打掉（图一）。墓中金银器被洗劫一空，随葬的 71 件瓷器全被打碎。这件元青花盘亦不例外，也被打成碎片，但确为张弘略墓随葬器物无疑。

这次保定之行重点考察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瓷。这是一件元青花兰草纹折腹盘，圈足沙底，口径 14.3、底径 5.5、高 3.2 厘米。盘内和盘底

图二 瓷 盘

1.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 2、3.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出土卵白釉芒口盘 4.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出土卵白釉芒口盘



绘单圈青花,盘心和外壁绘兰草纹(图二:1)^[12]。盘心图案有点像波斯文,我们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和德黑兰大学乌苏吉教授帮助解读,但他们认为其是花草图案而非文字。目前所知景德镇枢府瓷中,有三件卵白釉盘与之相似,其中两件为湖田窑刘家坞遗址发掘品,芒口,圈足沙底,内壁印缠枝菊纹(图二:2、3),现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3];第三件出自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亦为芒口瓷,圈足沙底,口径 17.2、足径 6.4、高 4.9 厘米(图一:4),现藏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14]。

据藏文古籍《汉藏史集》记载,元成宗时期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有一种“被

称作扎俄马的碗,里面绘层叠的莲花,碗口绘彩绘纹围绕,是在帝师扎巴俄色时期(1294~1303年)出现的”^[15]。扎巴俄色,《元史》作“乞刺思八斡节儿”,世祖末成宗初任帝师^[16]。故知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元青花缠枝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元代从中东地区引入烧酒工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刊刻的《饮膳正要》记载:“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17]于是品尝烧酒的小酒器在元代应运而生^[18]。

关于元人饮酒方式,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曰:“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饌,酒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



图三
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
版画局部

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主人捧台盏于前,以盏令倾酒自先尝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再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根底拿一盏淡酒,望官人休怪。’候官员接盏后,主人则持盘退三步,再跪,待饮尽,起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如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子者则进而献之。”^[19]从书中所附《把官员盏》版画看,元成宗时的青花碗可与定兴窖藏青花盘配套,作为饮烧酒的酒器使用(图三)。

张弘略墓青花盘与元代宫廷酒器共出,而忽必烈曾经赏赐张弘略宫廷御酒。《元史·张弘略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今北京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实为“元贞元年”,1295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20]元朝皇帝赐酒应包括酒器,那么这件青花盘或为1292年忽必烈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至元十六年(1279年),张弘范崖山海战攻灭南宋海军,元朝统一中国^[21]。《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22]故知南宋灭亡前夕,忽必烈就在距京师数千里之遥的景德镇设浮梁磁局,开始为元朝皇室烧造瓷器。不过,浮梁

磁局不像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窑场。元朝督陶官可能选择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的民窑作为定点窑场,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生产。就目前资料而言,元初最可能成为浮梁磁局窑场的是湖田窑,而湖田刘家坞枢府窑烧造的“玉”字款卵白釉瓷可能是浮梁磁局为玉宸院烧制的第一批瓷器^[23]。张弘略墓青花盘与湖田窑卵白釉芒口折腹盘如出一辙,很可能在湖田窑刘家坞枢府窑烧造。

二 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无独有偶。1972年4月,张弘略老家——河北定兴县南关发现一处元代高档瓷器窖藏,出土了青花高足杯2件,卵白釉折腹碗3件,卵白釉菊花纹花口盘1件,青白釉菊花纹印花盘1件,龙泉窑刻花盘1件,白釉牡丹纹印花盘1件,钧窑盘2件,卵白釉双凤纹匜1件^[24]。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早就注意到这件青花高足斗笠碗年代久远。1973年,他撰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省定兴县窖藏出土的一件青花梅花纹高足碗,无论器形纹饰和胎釉,均与上述中期晚期者不同。碗的形式是大口尖底,与宋代习见的盏式相同。碗里绘梅花一枝,花上侧绘一弯月,这种月梅纹见于南宋龙泉窑和吉州窑的碗内;碗下部有高足,足的高度与碗高约略相等,足外凸起弦纹六条,碗和足的胎都很薄,与习见青花高足碗的胎不同。这件高足碗是目前所见出土元青花中唯一属于早



图四 高足杯、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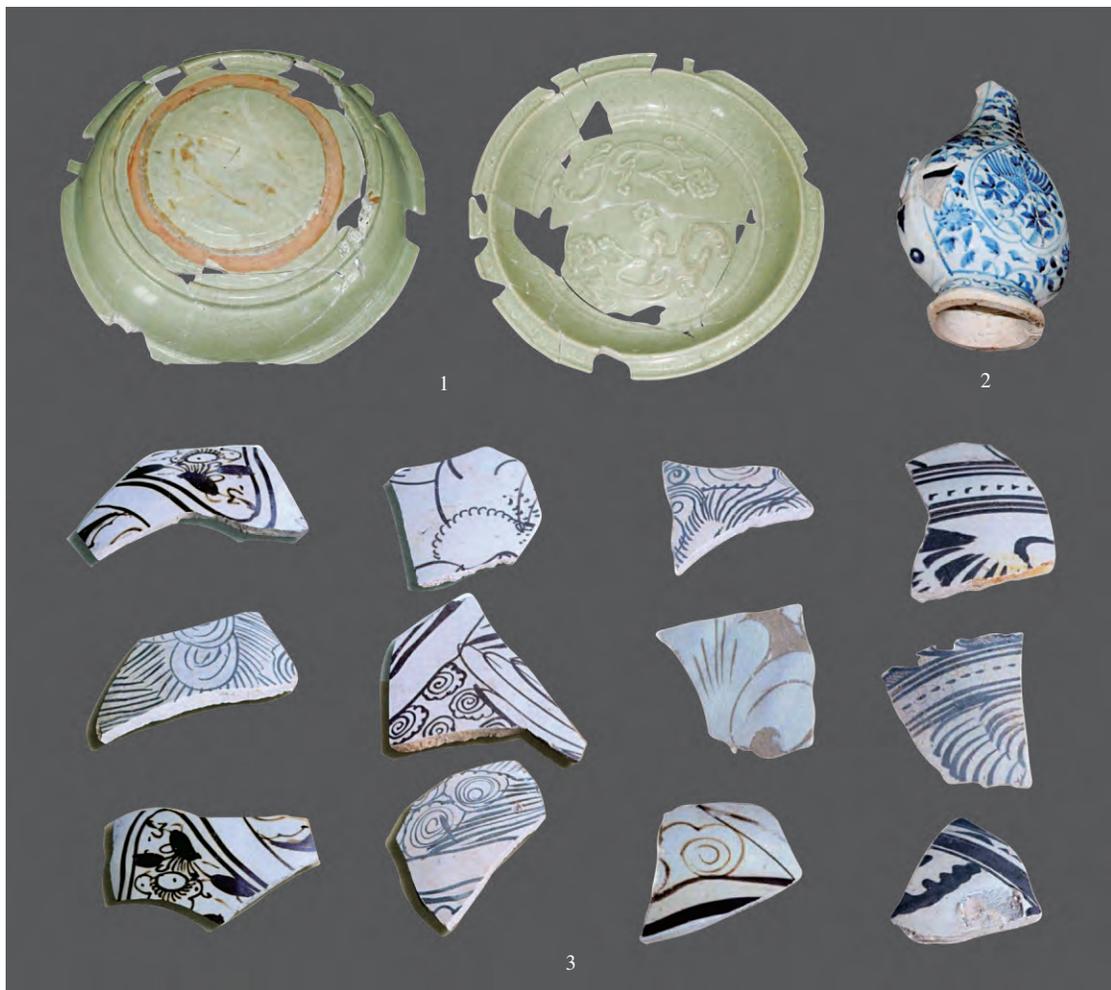
1.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 2.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 3.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 4.湖田窑遗址出土卵白釉竹节高足杯 5.北京海淀金墓出土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 6.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期的一件作品。”他还指出:青花瓷起源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的技术来源于吉州窑的釉下彩绘。一种

情况是南宋末吉州窑停烧,窑工来到景德镇,另一种可能是永和镇的画工来到景德镇^[29]。



图五 基什岛出土元代磁州窑和德化窑瓷片与首都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



图六 爪哇、特鲁乌兰出土瓷器

1.爪哇出土元龙泉青瓷大盘 2.特鲁乌兰遗址出土元青花双耳壶 3.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磁州窑瓷片

这两件元青花高足杯颇有特点,高足皆为竹节状。一件为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口径11.8、底径4.5、高9.5厘米(图四:1),器形与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口径11.5、高9.5厘米;图四:2)相同^[26]。另一件为青花飞凤纹高足杯,杯身为半球形,口径12.2、高9.8厘米,口沿内绘缠枝卷草纹,杯心写有“寿”字青花款(图四:3)^[27]。

北京海淀金墓出土过一件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可能是南宋给金朝的贡品,现为首都博物馆展品(图四:5)。《元史·孛术鲁朮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元七年(1271年),“帝师

(八思巴)至京师,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元朝女真大臣)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28]所谓“觞”,即羽觞,本指古代饮酒的耳杯。不过,元代以前就不流行耳杯了,八思巴饮酒所用“觞”当为金银器或景德镇青白瓷高足杯。

海淀金墓青白釉高足杯与定兴窖藏青花飞凤纹高足杯颇为相似,只是高足非竹节状。不过,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遗址发掘出土两件卵白釉竹节高足杯。一件口沿已残,

残高 9、足径 4.1、足高 4.9 厘米,杯心印栀子团花,内壁模印四爪云龙纹;另一件素面无纹,口径 11.4、足径 3.9、足高 4.9、通高 9.6 厘米(图四:4)。这两件枢府瓷高足杯与定兴窖藏的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如出一辙^[29]。尽管内蒙古集宁路和江西高安元代晚期窖藏也有竹节高足杯,但是杯身为墩式碗造型,与元代早期斗笠形或半球形竹节高足杯不可同日而语^[30]。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高 9.2 厘米。耐人寻味的是,这件元青花高足杯为枢府瓷,内壁印有云龙纹和“玉”字款(图四:6)^[31]。2012 年,香港苏富比秋拍成交的玫茵堂旧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亦为“玉”字款枢府瓷^[32]。如前所述,此类“玉”字款枢府瓷是为玉宸院烧造的。《元史·百官志》记载:“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佾事、同佾、院判。至大四年(1311 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33]据此,元青花龙纹“玉”字款竹节高足杯当不晚于 1311 年玉宸乐院复归仪凤司^[34]。

如前所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以前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据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又在元文宗时传入青藏高原,“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所以为其他人所仿效。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花龙作图案,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据说在旺秋尊追以前就停止制造了”^[35]。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元年(1330 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即甲哇桑布)、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思藏土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36]。可知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在 1330 年或稍晚,那么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当在这时传入青藏高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皆为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有元一代,张柔家族堪称保定地区最大的

豪门贵族,定兴窖藏出土元代高档瓷器必为张家藏品无疑。《新元史·张珪传》记载:“天历元年(1328 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败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张珪长子)与同知阿里沙率乡民挺毙数百人。参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执景武兄弟五人,尽杀之,籍其家。诏以珪女归也先捏。”^[37]因此,定兴窖藏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与保定窖藏元青花的年代相同,不晚于 1328 年张珪家族被满门抄斩之际^[38]。

三 波斯钴料“苏麻离青”如何传入浮梁磁局

据考古调查,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Kāshān)地区钴矿,当地波斯人称 Sulaimani(苏来麻尼)^[39]。明中叶以前,景德镇烧造青花所用钴料主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转运而来,故称“苏麻离青”或“回回青”^[40]。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主要有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外国传》记载:“苏门答刺,在满刺加之西。顺风九昼夜可至……永乐二年遣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纱罗招徕之。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和未至,其酋宰奴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诏封为苏门答刺国王,赐印诰、彩币、裘衣。遂比年入贡,终成祖世不绝。郑和凡三使其国……贡物有宝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货舶至,贸易称平。”^[41]

其二,万历朝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42]

其三,万历朝高濂著《遵生八笺》亦载:“宣窑之青,乃苏淳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43]

近年有学者提出,苏淳泥青是苏门答刺国和南勃利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出产青料的合称^[44]。问题是,苏门答腊岛至今未见钴矿,显然只是转运波斯钴料的贸易口岸,那么元青花钴料又是如何经苏门答腊传入中国的呢?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位的关键时刻,伊利大汗旭烈兀支持元世祖忽必烈,故元朝与在波斯立国的伊利汗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己卯……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今斯里兰卡)。”^[45]正如张星烺指出的,阿不合即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Abaka),至元二年继承伊利大汗位,卒于至元十九年。张先生还认为,“元人在北,海道往波斯尚未通,故由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狮子国市药”^[46]。

元世祖显然是在大都(今北京)对阿八哈所遣波斯使团下的诏书,而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随波斯使团到狮子国买药只能走海路。为了提升元朝航海能力,元世祖至元十年三月“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天下。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州(今陕西安康市和洋县)、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47]。至元十年,南宋尚未平定,波斯使团无法利用泉州港,他们或许在山东半岛登陆。东晋法显从狮子国归国就是在山东半岛崂山登陆。早在至元九年(1272年),亦黑迷失就开辟了中国北方至印度洋之间的远洋航线,这位元初回鹘名臣有可能与法显采用同一航线^[48]。《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

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至元二年,入备宿卫。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赏赐甚厚。^[49]

至元十三年(1276年),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才并入元朝版图,此前元朝使臣无法利用泉州港。故陈得芝认为亦黑迷失可能从元朝治下的云南通过安南或緬国出海^[50]。刘迎胜则提出,当时元朝船队出海应从山东或苏北港口出发,船上水手也应是北方人^[51]。前一说法不能成立。《新元史》记载:“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今泰国清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自古不通中国。世祖中统初,命将征之,不

能达而还。”^[52]大德五年(1301年),张弘纲奉诏从云南再征八百媳妇,不幸战死沙场,归葬大都城南(今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53]。可知忽必烈从未打通云南到緬甸之路,亦黑迷失只能从海路去波斯。

众所周知,登州(今蓬莱水城)是元朝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重要口岸。2005年,蓬莱水城遗址发现三艘元代海船。其中一艘发掘出高丽青瓷,被鉴定为高丽海船^[54]。可知元代登州有着发达的造船业和远洋航海能力,至元十一年和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渡海征倭就从这里启航^[55]。元代高丽名臣李齐贤《上征东省书》曰:“忠烈王之世,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王遣金方庆等。修其战舰,每为先锋。”^[56]亦黑迷失于至元九年和十二年两次出使印度洋马八儿国显然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启航。

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远洋航线,《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今印度西海岸奎隆)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57]元代波斯湾有两大海港:一在忽鲁谟斯旧港(今伊朗东南米纳布),属于忽鲁谟斯王国;另一在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属于伊利汗国^[58]。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Williamson)博士在基什岛采集到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残片和德化窑白瓷残片(图五:左)^[59]。前者与北京房山出土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图五:右)的器形和纹样几乎完全相同^[60]。阿不合即伊利大汗阿八哈(Abaka),那么“阿不合大王城”当指波斯湾基什岛。

至元十六年二月,南宋灭亡。忽必烈先后派杨庭璧、哈撒儿海牙、亦黑迷失从泉州启航,出使马八儿、狮子和俱蓝等国。《元史·马八儿等国传》记载: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今南印度奎隆)。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十月,授哈撒儿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

山(今斯里兰卡)……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今南印度本地治理)马头,登岸^[61]……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国主及其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会苏木达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壁皆从其请。四月,还至那旺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庭壁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木都刺国(今苏门答腊),国主土汉八的迎使者。庭壁因喻以大意,土汉八的即日纳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二人入朝。^[62]

所谓“苏木达国”,即苏木都刺国,两者皆为梵语 Samudra(苏门答腊)之音译。苏木都刺国当时臣服于爪哇岛的新柯沙里王朝,故马可·波罗称苏门答腊为“小爪哇岛”,而将爪哇称作“爪哇大岛”^[63]。至元十九年(1282年),杨庭璧说服苏木都刺国王派使节与元朝建立友好关系。尽管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地区的钴矿,但史书却称作“苏麻离青”(或苏泥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如前所述,其名应当来自苏门答腊,那么景德镇烧造元青花所用钴料很可能是1282年苏木都刺国使臣或商人带到江西景德镇的。

14世纪中叶,满者伯夷国灭爪哇新柯沙里王国,称雄东南亚,《元史》称之为“麻喏巴歇国”。此后,苏木都刺国又臣服于满者伯夷国^[64]。近年爪哇海域出水了一个元代龙泉窑青瓷模印双龙纹大盘(图六:1),而满者伯夷首府特鲁乌兰(Trowulan)出土了许多磁州窑瓷片,多来自元代大罐、大坛、大盆、大盘和大碗(图六:3)。中国元代各窑口的瓷片也在特鲁乌兰遗址大量发掘出来。元青花碎片特别多,只有一件元青花双耳壶相对完整(图六:2)。这些元青花绘工精彩,颜色浓艳,系采用典型的苏麻离青进口青料^[65]。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

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谿降南巫里、速木都刺、不鲁不都、八刺刺诸小国。”^[66]所谓“速木都刺”,即印尼苏门答腊岛。此后,苏门答腊成了波斯钴料的重要贸易中心,而元青花钴料则被称作“苏麻离青”^[67]。

四 结 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折腹盘,以实物材料首次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折腹盘当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第二,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亦为早期元青花,其绘画工艺来自吉州窑釉下彩绘画及剪纸贴花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定兴窖藏元青花飞凤纹竹节高足杯与英国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藏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相似。后者为枢府瓷,内壁模印“玉”字款,年代不晚于至大四年(1311年)玉宸院复归仪凤司。从器形看,元青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采用元代中晚期流行的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第三,据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莲纹碗在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以前就已传入青藏高原,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或稍晚传入青藏高原。由此可知,元青花创烧年代当在13世纪末,而14世纪初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第四,早在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元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刺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离青”。

- [1] 河北省博物馆《保定市发现一批元代瓷器》,《文物》1965年第2期。
- [2] 林梅村《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 [3] 冯先铭《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出土文物展陶瓷展品谈起》,《文物》1973年第3期。
- [4] 黄清华、黄薇《元青花瓷器早期类型的新发现——从实证角度论元青花瓷器的起源》,《文物》2012年第11期。他们在落马桥遗址发现的波斯文款高足碗,器形与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北岸窑址、落马桥遗址及新疆阿力麻里古城采集的元青花高足碗相同,实乃元代晚期之物(刘新园等《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第11期;新疆文物局等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第359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
- [5] 林梅村《波斯建筑艺术巡礼——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三》,《紫禁城》2012年第7期。
- [6] 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张柔四十九岁时,张弘范出生,金朝已亡国四年(李剑亮《张弘范其人其诗》,《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故坊间将张弘范比附为宋朝汉奸,纯属无稽之谈。
- [7] 孟繁峰、孙待林《张柔墓调查记》,《文物春秋》1996年第3期。
- [8]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2013年第5期。
- [9] 首都博物馆编《大元三都》,第59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 [10] (明)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下册,第255页,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
- [11] 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田丰陷保定路,朝廷遣使谕之,为所杀。丰又陷孟州、赵州”(《新元史·韩林儿张士诚传》,第3286页,开明书店,1935年。以下皆据此版本,不另注)。
- [12] 同[9],第53-61页。
- [13] 肖发标编《景德镇枢府窑作品集》,第102页,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 [14]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合编《景德镇出土陶瓷》,第124页,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 [15] (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32-13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16] 《元史·释老志》记载:“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1294年)卒。乞刺斯八斡节儿嗣,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1295年),又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大德七年(1303年)卒”(《元史·释老志》,第4518-4519页,中华书局,1976年。以下皆据此版本,不另注)。这枚帝师印现藏拉萨罗布林卡,双龙纽白玉方印,高8.1、边长9.6厘米。据考证,所刻八思巴蒙古文读作“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蔡美彪《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第3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 [17]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第208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
- [18] 李映发《十三至十五世纪亚洲酿酒技术考察》,《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2期;王猛、仪德刚《元代蒸馏酒制作技艺及其现代调查研究》,《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 [19] (宋)陈元靓著、元人增补《事林广记》前集卷一,第297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
- [20] 《元史·张弘略传》,第3478页。关于张弘略的卒年,墓志记作“元真元年”(即元贞元年,1295年),神道碑作“元贞乙未”(即元贞元年),故《元史》所记“元贞二年”有误(张国旺《元代张弘略事迹考略——以张弘略墓志和神道碑铭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
- [21] 《元史·张弘范传》,第3683页。
- [22] 《元史·百官志》,第2227页。
- [23] 肖发标等《湖田刘家坞“枢府窑”清理报告》,《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肖发标《湖田窑发现元代“玉”字款卵白瓷高足杯》,《南方文物》2001年第2期;江建新《元青花与浮梁磁局及其窑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
- [24] 刘来成《河北定兴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年第1期。
- [25] 同[3]。
- [26]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陶瓷全集》第6卷(山东卷),第20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 [27] 张柏主编《中国出土陶瓷全集》第3卷(河北卷),第22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 [28] 《元史·孛术鲁朮传》,第4222页。
- [29] 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景德镇湖田窑址》上册,第32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 [30] 元代晚期高足杯,参见陈永志主编《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刘金成《高安元代窖藏瓷器》,朝华出版社,2006年;余佩瑾《内蒙古出土的元青花高足杯及其相关问题》,《幽蓝神采——2012年上海元青花国

-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辑,第82~1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31] 同[13],第146页。
- [32] 这件元青花龙纹高足杯的彩色照片,参见 Regina Krahl, *Th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vol.3-2*,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4-2010, No.1619。
- [33] 《元史·百官志一》,第2138页。
- [34] 张咏春《元代仪凤司考》,《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3期。
- [35] 同[15],第132~133页。
- [36] 《元史·文宗纪三》,第750页。
- [37] 《新元史·张珪传》,第2419页。
- [3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拙文《元朝重臣张珪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
- [39] 温睿《苏麻离青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1期。此文作者认为“苏麻离青”之名来自波斯语 Sulaimani,不一定正确。
- [40] 此说最早为英国学者赛尔倡导(G.R.Sayer, *Ching-te-chen Tao-lu*,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1951, p.43)。
- [41] 《明史·外国传六》,第8420~8422页,中华书局,1974年。
- [42] (明)王世懋《窺天外乘》,《记录汇编》(四),第2235~223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 [43] (明)高濂《遵生八笺》,《四库全书珍本九集》第13册,第5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 [44] 杜峰、苏宝茹《两种不同的进口钴料:“苏麻离青”与“苏渤泥青”》,《中国科学E辑》2007年第5期。
- [45] 《元史·世祖纪》,第147~148页。
- [46]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383页,中华书局,1973年。
- [47] 《元史·世祖纪》,第148页。
- [48] 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49] 《元史·亦黑迷失传》,第3198页。
- [50] 陈得芝《从亦黑迷失身份看马可·波罗——〈一百大寺看经记〉碑背景解读》,《燕京学报》新二十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1]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集》,第466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 [52] 《新元史·八百媳妇传》,第3597页。
- [5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杨毓骧《蒙元军队征战东南亚属地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54] 袁晓春《蓬莱高丽朝鲜古船造船与保护技术》,《国家航海》第二辑,2017年。
- [55] 周霞《元朝时期登州与高丽的海上交通》,《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蓬莱,2008年。
- [56] [高丽]李齐贤《益斋乱藁》,第616页(转引自帅倩《广州元代高丽穆斯林刺马丹墓碑补考》,《回族研究》2012年第4期)。
- [57] 《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第4669页。
- [58] 钱江《古代波斯湾的航海活动与贸易港埠》,《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2期。
- [59] 这些元代德化窑和磁州窑瓷片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在伊朗基什岛采集的,现藏杜伦大学考古系。张然博士提供这张照片,谨致谢忱。
- [60] 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册,第77页,图47,北京出版社,1999年。
- [61] 所谓“新村”,源于泰米尔语 Pondicherry(周运中《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 [62] 《元史·马八儿国传》,第4669、4670页。
- [63]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第402~407页,中华书局,1954年。
- [64] George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8, pp.200-201; 桂光华《满者伯夷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
- [65] 林亦秋《元磁州窑瓷在印尼满者伯夷王朝的风光》,《收藏》2012年第21期。
- [66] 《元史·亦黑迷失传》,第3199页。
- [67] 林梅村《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责任编辑:杨冠华)

安徽肥东小黄村西汉墓发掘简报

小黄村墓群位于安徽省肥东县包公镇文集乡小黄村。为配合基本建设，2014年7~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汉代至清代墓葬20余座。其中M10、M11为西汉墓，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平面呈“凸”字形。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及竹器等。两墓位置并列、形制相近、方向一致，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的发掘为安徽地区西汉时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2013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在满城张弘略墓发掘出元青花折腹盘、龙泉窑龙纹玉壶春瓶等元代高档瓷器，首次以实物材料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据藏文古籍记载，元青花莲纹碗在1303年以前就已传入西藏，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1330年传入青藏高原。据本文考证，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实乃元朝皇帝赏赐张氏家族之物，年代不晚于1328年三朝元老张瑄被满门抄斩之际。早在1272年，元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刺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离青”。

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简报

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20米。2013年9~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出土了34尊佛教造像，包括立式佛像、坐式佛像、立式菩萨像、骑象普贤菩萨、背屏式佛造像、跪式供养人像等。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以北齐为最多，均为寺院供养佛像。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应是当时的寺院受到强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毁坏并埋藏的行为。据出土情况推测，佛教造像埋藏时间应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至会昌五年（845年）。